

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

李 清, 马泽汉

(吉林大学 商学与管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方向、作用机制与差异化作用效果。研究发现:降低企业税负可以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降低企业税负能够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两条中介路径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纳税贡献高、审计任期短以及分析师关注度高的公司中,降低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更加明显。

[关键词]减税降费;税收征管;企业税负;会计信息质量;融资约束;代理成本;政府干预

[中图分类号]F230;F810.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3)05-0041-10

一、引言

“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党中央提出了“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其中“降成本”就是指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阵。由此,一系列积极的财税政策陆续铺开,旨在减轻企业成本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提振投资意愿,增强本土企业竞争力,以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得益于党中央高超的战略智慧,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逐年下降,大量新办涉税市场主体不断涌现,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大幅增强,为抵御新冠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经济大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已有研究表明,施行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税负有利于增加企业内源性资金、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进而可以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创新效率^[1],增加企业经营性投资、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2],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3]。

会计信息是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石,也是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的关键依据,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提高利益相关者决策效率,进而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在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文献中,一些研究深入挖掘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高额的薪酬激励^[4]、勤勉的独立董事^[5]、权力受控的管理层^[6]都能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也有研究表明,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公司风险,提高会计信息质量^[7]。另有研究致力于探索外部监督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发现较多的分析师关注^[8]、频繁的媒体报道^[9]、健全的法制环境^[10]都能有效促进会计信息质量提高。

综上,虽然诸多研究已经证实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税负会产生一系列积极的经济后果,但未见有研究关注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拟探讨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方向、作用机制与差异化作用效果。本文可能的贡献包括以下四点:第一,填补企

[收稿日期]2023-02-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GL067)

[作者简介]李清(1966—),男,黑龙江逊克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数据挖掘、会计信息系统及内部控制;马泽汉(1995—),女,黑龙江大庆人,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数据挖掘,通讯作者,邮箱:2367268071@qq.com。

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性领域的研究空白,验明减税降费能对市场主体产生积极影响的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第二,明晰降低企业税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机理,提供减税降费政策能够缓解融资困境、约束寻租行为的经验证据。第三,揭示企业纳税贡献、事务所审计任期、分析师关注度对减税降费政策施行效果的影响,为更加精准地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锚定方向。第四,使用指数度量会计信息质量,反映的会计信息质量更加全面、客观、真实,使实证结果更加可靠。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政府干预是公司必须面对的外部监管手段。在理想情况下,政府干预应当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可以有效改善组织效率,来自政府的刚性约束能够确保公司治理的底线,而具备一定弹性的监管政策则会促使被监管公司主动遵循非强制性指引建议来获取额外收益^[11]。同时也有研究揭示了政府干预的负向影响:一方面,政府治理的目标是寻求社会效用最大化,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目标是寻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公司治理的目标则是寻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当政府的政策性目标或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之间存在冲突时,政府或政府官员的寻租活动就会使公司承担诸如扩张本地投资规模、增加纳税金额等相应的政治成本^[12];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投融资、提供就业岗位和纳税等方面都对地方经济起到支柱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的保护意愿非常强烈,地方政府的干预会削弱媒体舆论监督等外部监督渠道的作用,进而加重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失真现象^[9]。

(一) 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

税收征管是政府对公司施行的强制性干预,同样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如图 1 所示。正向影响被称为“治理效应”,政府因税收征管而拥有的对公司现金流的要求权使其成了最大的小股东^[13],政府的税务稽查活动通常包括关注税金差异、核实账目信息、监督关联交易、审批转移定价等。在“经济人”假设下,严格的税收征管使管理者不得不在业绩粉饰行为的利弊:一方面,如果向上盈余管理产生的所得税成本无法通过其他渠道得到弥补,管理者就会及时释放资产损失或投资亏损的信息,报告较低的真实盈余水平,节约所得税成本^[14];另一方面,管理者通过向下盈余管理过度避税会被税务机关施以行政处罚,被处罚的风险会抑制管理者通过应计项目少报收入的行为^[15]。在委托代理理论中,代理成本主要是指委托人监督、约束代理人的成本,税收征管这一外部监督与约束机制的积极溢出效应就是降低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约束了管理者盈余管理、偷懒、高在职消费等自利和机会主义道德风险,进而使财务报告质量得到提高^[16]。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_a: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即减轻企业税负、降低税收征管强度会降低税收征管“治理效应”的作用,使会计信息质量下降。

H1_b:“治理效应”使代理成本在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的正相关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二) 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

税收征管的负向影响包括“征税效应”和“寻租效应”。“征税效应”认为纳税会导致公司现金流出和留存收益减少,根据融资优序理论,公司融资首先考虑内源性资金,然而此时生产研发环节的资金投入量和投融资决策却会受到税收征管力度掣肘,大大提高了公司外部融资需求和融资成本,因此融资约束增加^[17]。由前景理论可知,当面临纳税导致的融资困境时,公司会尝试通过风险性更高的激进方式来减少损失^[18],有可能为了获得外源性资金铤而走险,比如通过伪造合同、虚构销售业务或通过隐蔽复杂的关联交易虚增资产、收入和利润,来达到配股或债务契约的条件,公司在财务报表中所报告的内容就会严重失真并且模糊难以理解或比较。

税收征管的“寻租效应”认为征税可能成为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滋生的温床,根据寻租理论,税务部门对公司的干预和管制会形成寻租空间,租金通常由公司负担,若管理者主动寻租——为拉近与税务人员的私人关系而耗用公司资源,或者被动寻租——为应对频繁的税务检查活动而额外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公司的非生产性隐性成本会急剧增加^[19]。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政企双向寻租损害了股东利益,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因此上升,管理者在将这些额外的甚至是违规的支出入账时,多会选择不易追溯的综合性成本费用类科目以便掩饰,公司会计数据随着这些非生产性隐性成本的增加而失真^[20]。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2_a: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负相关,即减轻企业税负、降低税收征管强度会削弱税收征管“征税效应”和“寻租效应”的作用,使会计信息质量上升。

H2_b:“征税效应”使融资约束在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的负相关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H2_c:“寻租效应”使代理成本在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的负相关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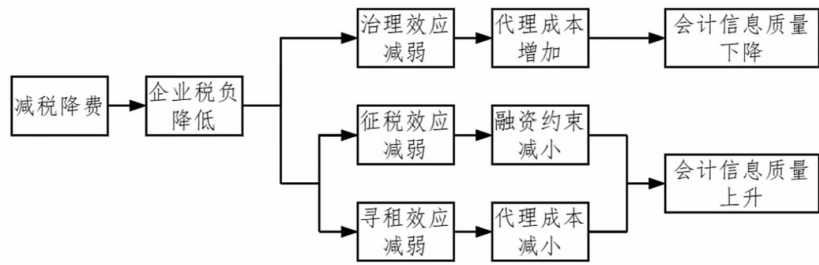


图1 企业税负降低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依次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业公司;(2)剔除ST、*ST公司;(3)剔除上市未满3年的公司;(4)剔除主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获得3223家公司7年内共15736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经济基本面数据来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内部控制指数来自迪博数据库。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做上下1% Winsorize 缩尾处理。使用Stata15.0进行统计分析。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会计信息质量指数(Quality),参照李清和马泽汉的做法^[21],从可靠性、相关性、稳健性、可比性和及时性五个方面综合计量会计信息质量,其中可靠性用应计盈余管理程度和 Beneish 会计舞弊风险指标——应收账款周转指数及资产质量指数^[21]综合计量。各指标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表1 会计信息质量指数指标定义

指标	计算方法
应计 盈余 管理 程度	使用截面修正的 Jones 模型 ^[22] , $DA_{i,t}$ 的绝对值是应计盈余管理程度
	$TA_{i,t}/A_{i,t-1} = \alpha_0/A_{i,t-1} + \alpha_1(\Delta REV_{i,t}/A_{i,t-1}) + \alpha_2(PPE_{i,t}/A_{i,t-1}) + \varepsilon_{i,t}$
	$NDA_{i,t} = \hat{\alpha}_0/A_{i,t-1} + \hat{\alpha}_1[(\Delta REV_{i,t} - \Delta REC_{i,t})/A_{i,t-1}] + \hat{\alpha}_2(PPE_{i,t}/A_{i,t-1})$ $DA_{i,t} = TA_{i,t}/A_{i,t-1} - NDA_{i,t}$
可靠 性	应收账款周转指数 =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_{i,t}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_{i,t-1} = [(应收票据余额 + 应收账款净额 + 坏账准备)/营业收入 × 365] _{i,t} / [(应收票据余额 + 应收账款净额 + 坏账准备)/营业收入 × 365] _{i,t-1}
	应收票据余额、应收账款净额和坏账准备,各取其期初、期末金额的平均值
资产 质量 指数	资产质量指数 = [1 - (固定资产净额 + 流动资产总计)/资产总计] _{i,t} / [1 - (固定资产净额 + 流动资产总计)/资产总计] _{i,t-1}
	固定资产净额 = 固定资产原值 - 累计折旧 - 资产减值准备
相关性	使用 Ohlson 模型 ^[23] , $P_{i,t+1} = \nu_0 + \nu_1 EPS_{i,t} + \nu_2 BV_{i,t} + \varepsilon_{i,t}$, $\varepsilon_{i,t}$ 的绝对值为相关性
稳健性	使用 Khan 等的模型 ^[24] , $C_Score = \lambda_0 + \lambda_1 SIZE_{i,t} + \lambda_2 MTB_{i,t} + \lambda_3 LEV_{i,t}$ 为稳健性
可比性	使用 André 等的模型 ^[25] , $COMP_{i,t} = -1 Earnings_{i,t} - E(Earnings)_{i,t}$ 为可比性
及时性	及时性等于会计年度结束日至财务报表披露日之间的股票交易天数(包含披露日当天),若报表在非交易日披露,将过后首个交易日视为披露日 ^[26]

会计信息质量指数可以连续、精细、直观、完整地刻画会计信息质量,其构建方法为:首先,为使指标之

间具有可加性,且跨行业具有可比性,先行剔除存在行业差异的应计盈余管理程度、相关性、稳健性和可比性中包含的行业因素,即减去本指标年度行业中位数,再使用极差标准化法分年度对所有指标做无量纲化处理。其次,视各指标权重在相同年度内相等,使用算术平均法赋权。计算公式如式(1)、式(2)所示。

$$\text{可靠性} = (\text{应计盈余管理程度} + \text{应收账款周转指数} + \text{资产质量指数}) / 3 \quad (1)$$

$$\text{会计信息质量指数} = (\text{可靠性} + \text{相关性} + \text{稳健性} + \text{可比性} + \text{及时性}) / 5 \quad (2)$$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企业税负 (*Taxbur*)。借鉴刘骏和刘峰的方法^[27],使用基于现金流量表的企业税负衡量指标,即:企业税负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营业收入。异于以往用企业所得税额衡量企业税负,基于现金流量表的企业税费支出能涵盖企业经营涉及的全部税种,扣除税费返还能体现企业当期实际负担的税收相关现金净流出情况,与税务局统计税收依据的实际入库金额口径一致。

3. 中介变量

(1)代理成本 (*Agecos*)。代理成本的异动在报表中表现为通用的费用项目余额超出当期经营规模所需要的投入量,这些费用项目的下级科目复杂繁多,综合性极强,公司通常将无法给出合理解释但不得不入账的支出放在这些项目下,参照王晓亮和邓可斌的研究^[28],以经过营业收入调整的管理费用与销售费用之和来计算代理成本,排除正常生产经营对应的合理的费用支出。(2)融资约束 (*Fincon*)。融资约束的主流计量方法有 KZ 指数、WW 指数和 SA 指数三种,SA 指数通过有序 Probit 模型推断出融资约束是公司规模和上市时长这两个外生因素的函数,规避了 KZ 指数和 WW 指数使用财务指标计算融资约束导致的内生性问题^[29],因此本文使用 SA 指数计量融资约束, $SA = -0.737 \times \ln \text{总资产} + 0.043 \times \ln \text{总资产}^2 - 0.04 \times \text{上市时长}$,SA 指数越大则融资约束越大。

4. 控制变量

参照黄芳、叶邦银、戴亦一等的研究选取控制变量^[6-7,9],如表 2 所示。因被解释变量会计信息质量指数在构建过程中已剔除行业因素,所以不再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又因宏观环境变量为年度省级变量,同年同省份的样本对应的值相同,若引入年度虚拟变量和省份虚拟变量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所以也不再另行控制年度固定效应和省份固定效应。

表 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i>Quality</i>	会计信息质量指数	(可靠性 + 相关性 + 稳健性 + 可比性 + 及时性) / 5
解释变量	<i>Taxbur</i>	企业税负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收到的税费返还) / 营业收入
中介变量	<i>Agecos</i>	代理成本	(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 / 营业收入
	<i>Fincon</i>	融资约束	SA 指数
公司特征	<i>ATB</i>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 / 总资产
	<i>ROTA</i>	总资产报酬率	(利润总额 + 财务费用) / 总资产期初期末均值
	<i>DTAC</i>	递延所得税资产波动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前 3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均值
	<i>Age</i>	上市时长	上市天数以 365 天/年折算为年
控制变量	<i>Size</i>	企业规模	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i>SOE</i>	产权性质	若为国有企业,则取值为 1,否则取 0
	<i>Stkcon</i>	股权集中度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
公司治理	<i>Top3</i>	前 3 名董监高薪酬	前 3 名董监高薪酬总额取自然对数
	<i>Same</i>	会计独董是否同地	若会计专业独董办公地点与公司所在地相同,则取值为 1,否则取 0
	<i>Abse</i>	独董是否缺席会议	若存在独董缺席会议的情况,则取值为 1,否则取 0
内部控制	<i>DIB</i>	内部控制指数	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取自然对数
宏观环境	<i>AveGDP</i>	各省市地区人均 GDP	所属省市地区的人均 GDP 取自然对数

(三) 模型构建

为检验企业税负如何影响会计信息质量,本文建立主回归模型(3)如下:

$$Quality_{i,t} = \beta_0 + \beta_1 Taxbur_{i,t} +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Quality_{i,t}$ 为会计信息质量指数, $Taxbur_{i,t}$ 为企业税负, $Controls_{i,t}$ 为控制变量。

四、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被解释变量会计信息质量指数 ($Quality$) 处于 [0.5468, 0.8931] 区间, 数据分布两端稀疏中间密集, 可有效识别会计信息质量最优与最差的公司。解释变量企业税负 ($Taxbur$) 的分布同为两端稀疏中间密集, 可有效识别税收负担最小与最大的公司。中介变量中, 代理成本 ($Agecos$) 的分布则为低密高疏, 融资约束 ($Fincon$) 的分布仍为两端稀疏中间密集, 存在严重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过大的公司能够被有效识别。

表 3 关键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 分位数	中位数	75% 分位数	最大值
$Quality$	15736	0.7573	0.0741	0.5468	0.7302	0.7680	0.7989	0.8931
$Taxbur$	15736	0.0555	0.0577	-0.0586	0.0206	0.0431	0.0763	0.3056
$Agecos$	15736	0.1587	0.1311	0.0135	0.0705	0.1194	0.2020	0.7403
$Fincon$	15736	-3.8896	0.2342	-4.4661	-4.0443	-3.8898	-3.7441	-3.1827

(二) 主回归分析

主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由于 White 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数据存在异方差, 因此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进行修正, 此后回归均采用此做法。企业税负 ($Taxbur$) 系数显著为负, 可知假设 H2_a 得证, 即企业税负越低会计信息质量越好。原因在于, 当企业税负下降时, 管理者既无需为了缓解征税导致的现金流紧张引入外源性资金而美化报表信息, 也无需为了掩盖政企双向寻租产生的非生产性隐性成本而操纵会计数据, 会计信息质量由此提升。另外, 方差膨胀因子 VIF 值最大为 2.03, 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 主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主回归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信息披露 考评结果	盈余管理 程度	
$Taxbur$	-0.0973 *** (-8.53)	-0.9117 * (-1.74)	0.0646 *** (5.59)	-0.1178 *** (-6.7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Cons$	0.4354 *** (21.06)	-6.8553 *** (-7.40)	0.0957 *** (5.03)	0.4202 *** (20.31)
adj_R ² /Pseudo R ²	0.0524	0.1727	0.0988	0.0505
F/Wald chi2	60.95	1348.28	57.13	58.79
obs	15736	13844	15736	15736

注: *, **,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为经异方差调整的 t 值。下同。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1) 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证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将证交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为 A 或 B 的赋值为 1, 表示信息披露质量高; 考评结果为 C 或 D 的赋值为 0, 表示信息披露质量低, 以此二元变量衡量会计信息质量。Logistic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企业税负 ($Taxbur$) 系数显著为负, 假设 H2_a 仍成立, 主回归结果稳健。

(2) 替换为盈余管理程度。参照叶邦银和王璇的方法^[7], 使用修正的 Jones 模型估算的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程度衡量会计信息质量, 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则会计信息质量越低,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企业税负 ($Taxbur$) 系数显著为正, 主回归结果稳健。

2. 替换解释变量

参照王佳和李文的方法^[30], 将企业税负的计算方法替换为 (营业税金及附加 + 所得税费用) / 营业收入,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企业税负 ($Taxbur$) 系数显著为负, 主回归结果稳健。

3. 内生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企业税负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反过来,会计信息质量也会影响企业税负,例如,公司存在偷、漏、骗税现象,并未如实反映经营状况,会计信息质量较差,企业税负也会下降。为了缓解上述可能存在的由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行业内其他公司的企业税负均值($AveTaxbur_t$)和滞后一期的企业税负($Taxbur_{t-1}$)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IV-2SLS)。如表5所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工具变量均能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税负,同时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工具变量选择合理。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使用工具变量拟合企业税负后,企业税负($Taxbur$)系数显著为负,主回归结果稳健。

(2) 倾向得分匹配法。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由样本自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重新选取样本进行回归。将企业税负大于中位数的样本设定为处理组,其余为控制组,以模型(3)中的控制变量为协变量,使用Logit回归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为无放回的最邻近1:1匹配,卡尺范围设定为0.001。匹配后通过了平衡性检验,且处理效应显著。基于匹配后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企业税负($Taxbur$)系数显著为负,主回归结果稳健。

表5 内生性检验

	IV-2SLS		PSM	Heckman		滞后一期
	第一阶段 $Taxbur_t$	第二阶段 $Quality$	模型(3) $Quality$	第一阶段 $Taxbur_dum$	第二阶段 $Quality$	模型(3) $Quality$
$AveTaxbur_t$	0.5364 *** (12.63)			20.5649 *** (44.91)		
$Taxbur_{t-1}$	0.3893 *** (9.21)					
$Taxbur$		-0.0805 *** (-5.33)	-0.0983 *** (-7.39)		-0.0860 *** (-7.11)	-0.0454 *** (-4.7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MR					-0.0017 * (-1.89)	
Cons	0.0797 *** (6.82)	0.4333 *** (20.90)	0.3974 *** (16.81)	3.1472 *** (8.29)	0.4340 *** (22.01)	0.4438 *** (20.63)
adj_R ² /Pseudo R ²	0.6055	0.0523	0.0577	0.1772	0.0526	0.0392
F/LR chi2	652.65	57.23	51.86	3866.61	63.36	40.80
obs	15736	15736	12112	15736	15736	14592

(3) Heckman两阶段模型。为了缓解可能存在的由样本自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同时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回归。第一阶段Probit模型的因变量为企业税负虚拟变量($Taxbur_dum$),若企业税负大于样本中位数则取值为1,否则为0,自变量包括模型(3)中的控制变量,并以行业内其他公司的企业税负均值($AveTaxbur_t$)作为排他性约束变量。将计算出的逆米尔斯比率(IMR)纳入模型(3)中作为第二阶段回归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企业税负($Taxbur$)系数显著为负,主回归结果稳健。

(4) 自变量滞后一期。为了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将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企业税负($Taxbur$)系数显著为负,主回归结果稳健。

五、中介效应分析

使用三步法检验中介效应可能因中介变量为内生变量而产生估计偏误,江艇认为中介效应分析可先用回归的方法检验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因果关系,再用理论分析的方法论证影响机制的合理性^[31]。故参照江艇的做法^[31],本文将中介变量代理成本和融资约束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检验企业税负对此二者的影响,结果如表6所示。在列(2)中,企业税负($Taxbur$)系数显著为正,即更低的企业税

负会产生更少的代理成本。由理论分析可知,降低税负可削弱税收征管的“寻租效应”,减少管理者主动或被动寻租产生的代理成本^[19],那么管理者将此类非生产性隐性成本藏入综合性成本费用类科目的行为也会减少,报表信息因此更加真实可靠^[32]。由此假设 H2₀ 得证,即降低企业税负,代理成本会相应减小,进而使会计信息质量上升。在列(3)中,企业税负(*Taxbur*)系数显著为正,即更低的企业税负会产生更小的融资约束。由理论分析可知,降低税负可削弱税收征管的“征税效应”,减少现金流出导致的融资约束^[17],那么管理者为了达到融资条件获得外源性资金而虚增资产、利润等违规行为也会减少,报表信息因此更加真实可靠^[33]。由此假设 H2₁ 得证,即降低企业税负,融资约束会相应减小,进而使会计信息质量上升。

表6 中介效应回归

	中介效应 - 代理成本		中介效应 - 融资约束	
	<i>Agecos</i>		<i>Fincon</i>	
<i>Taxbur</i>	0.8543 ***	(39.62)	0.1511 ***	(5.50)
<i>Controls</i>	Yes		Yes	
<i>Cons</i>	0.5853 ***	(19.22)	-4.6634 ***	(-74.21)
adj_R ²	0.3023		0.3159	
F	379.58		490.29	
obs	15736		15736	

六、异质性分析

(一) 纳税贡献

企业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政府为了完成税收任务,鼓励重点税源企业积极纳税,对本地纳税大户多有宣传嘉奖,纳税额高的企业因此赢得了由政府背书的良好社会声誉,所以会约束自身行为来维护企业形象。企业在面对纳税带来的融资约束时会尽量避免采取激进违规的解决方式,不对外披露经过粉饰的信息,减少可能引发信任危机的行为;企业在应对税务检查时会遵守规定、积极配合税务机关工作,不会有主动寻租贿赂税务人员企图逃避税务检查的举动。此外,地方财政对重点税源企业存在依赖性,政府为了稳定财税收入、防止重点税源流失,会尽可能地为其提供更加便利的营商环境,纳税大户面对政府时的议价能力显然高于其他企业^[34],税务机关不仅不会寻租获利,反而会提供精细的涉税政策辅导,帮助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节约税收征纳成本。可见,纳税贡献高的企业更注重行为的合规性,更愿意也更容易与税务部门之间建立和谐互信的关系,舞弊动机较弱,因此会充分利用降低税负对融资压力的减轻和税企关系的改善,使会计信息质量进一步提高。

本文以税费净支出金额作为企业纳税贡献的衡量指标,指标值越大则纳税贡献越高,根据该指标是否大于所属地区年度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的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见,纳税贡献高组的企业税负(*Taxbur*)系数绝对值大于纳税贡献低组,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综上可知,降低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在纳税贡献高的公司中更大。

表7 异质性分析

	纳税贡献高	纳税贡献低	审计任期长	审计任期短	分析师关注度高	分析师关注度低
<i>Taxbur</i>	-0.1086 *** (-6.94)	-0.0792 *** (-3.97)	-0.0803 *** (-4.84)	-0.1101 *** (-7.07)	-0.1352 *** (-7.43)	-0.0585 *** (-4.10)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i>	0.4023 *** (12.98)	0.4733 *** (14.51)	0.5042 *** (16.46)	0.3834 *** (13.61)	0.2706 *** (8.09)	0.5287 *** (18.80)
adj_R ²	0.0549	0.0521	0.0422	0.0615	0.0596	0.0622
F	32.29	31.17	23.70	39.47	35.25	38.50
obs	7860	7876	7349	8387	7427	8309
组间差异 p 值	0.094 *		0.090 *		0.000 ***	

注: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方法为自体抽样500次的费舍尔组合检验。

(二) 审计任期

会计师事务所独立审计是保证信息披露质量的关键环节。事务所初次承接审计业务时会充分了解

被审计单位的组织结构、生产经营情况、投融资活动、内部控制等基本特征,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也会恪守客观、公正的原则,保持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遵守独立性要求,细致严谨的审计工作使公司为了应对融资困境而实施的违规行为和政企寻租带来的非生产性成本被发现的可能性增加,减少公司舞弊机会,由此可以强化降低税负通过减少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效果。随着审计任期的延长,事务所可能对被审计单位产生经济依赖性,为了获得持续的审计业务收入默许被审计单位的违规行为,使审计人员在工作中无法保持独立审慎的原则,同时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各方面情况的判定也容易形成思维定式,审计质量随之降低^[35]。可见,审计任期的延长会减小被审计单位违规行为被发现并披露的可能性,而较短的审计任期则更有助于降低税负发挥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

本文根据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任期是否大于行业年度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的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见,审计任期长组的企业税负(*Taxbur*)系数绝对值小于审计任期短组,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综上可知,降低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在审计任期短的公司中更大。

(三) 分析师关注度

券商发布的个股研报是分析师通过跟踪个股最新信息、结合行业发展趋势与产业链上下游耦合关系做出的综合性研判,并从专业视角给出盈利预测和市值评估,以此向市场释放出积极或消极的信号,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公共监督者”的角色,广大投资者在决策前也会参考分析师做出的专业分析结果,被调研的公司受到分析师的监督和公众预期的约束,舞弊机会因此减少。此外,为了提高研报评级、获取或维持投资者的关注与信任,公司会努力提高业绩表现并严谨对待涉及信息披露的相关事项,舞弊动机因此减弱。已有研究证明,分析师关注度高的公司盈余质量更高^[8]。可见,降低税负对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限制能够减轻舞弊压力,分析师的高度关注能够减少舞弊机会、减弱舞弊动机,这一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力量可以与降低税负协同促进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

本文以分析师跟踪人数作为分析师关注度的衡量指标,指标值越大则分析师关注度越高,根据该指标是否大于行业年度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的结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见,分析师关注度高组的企业税负(*Taxbur*)系数绝对值大于分析师关注度低组,且通过了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综上可知,降低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在分析师关注度高的公司中更大。

七、结论性评述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探讨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方向、作用机制与差异化作用效果。经回归分析发现,企业税负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发现,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是企业税负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两条路径,降低企业税负可减小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在异质性分析中则发现,降低企业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在纳税贡献高、审计任期短、分析师关注度高的公司中更大。

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减税降费政策与公司之间的宏微观共振效应,对日后施行财税政策、缓解融资困境、约束寻租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以下启示。第一,施行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税负,可解燃眉之急、起纾困之效。近年来新冠疫情起伏反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减税降费可以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研发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对现行减税降费、退税缓税等措施,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因此应当坚定不移地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多种针对性政策工具协同发力,全面提升政策效能,通过“放水养鱼”来涵养税源,增强市场主体信心、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最终实现“水多鱼多”的局面。第二,施行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税负,能够增加公司现金流、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显著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一方面有利于与供应

商及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降低经营风险、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有利于缓解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降低股价暴跌风险、增加债权人信心、吸引更多优质投资者。以上各方面产生的增量收益最终也会反哺给财政税收,“风物长宜放眼量”,可观的长期宏观经济效益是施行减税降费政策的底气。第三,异质性分析辨明了降低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受纳税贡献、审计任期、分析师关注度影响时的不同表现,得到启示如下。(1)降低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在纳税贡献低的公司中较小。因此要进一步提高纳税贡献低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政府部门就应当构建“亲”“清”税企关系,使非纳税大户也能免受权力寻租的干扰。(2)降低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在审计任期长的公司中较小。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审计任期长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监管部门就应当加强对长期委托同一家事务所的审计项目的监管力度,也可考虑建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强制轮换制度,避免审计任期过长。(3)降低税负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在分析师关注度低的公司中较小。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分析师关注度低的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监管部门就应当将此类公司作为重点监督对象,补齐因分析师关注不足产生的监督力量缺口。

参考文献:

- [1] 邓力平,何巧,王智烜. 减税降费背景下企业税负对创新的影响研究[J]. 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6):101-111.
- [2] 李卫兵,王利霞. 减税降费能抑制企业金融化吗?——来自“营改增”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南方金融,2021(7):40-53.
- [3] 段姝,刘霞,殷蓉,等. 减税降费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了吗? [J]. 经济问题,2022(1):20-30.
- [4] Warfield T D, Wild J J, Wild K L. Managerial ownership, accounting choices, and informativeness of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95,20(1):61-91.
- [5] 陆静,张莹,向诚. 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 A 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02-120.
- [6] 黄芳,张莉芳. 管理层权力、审计委员会主任——高管私人关系与会计信息质量[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0(1):25-33.
- [7] 叶邦银,王璇. 董事会断裂带、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2(1):58-68.
- [8] 谢震,熊金武. 分析师关注与盈余管理: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分析[J]. 财贸研究,2014(2):139-149.
- [9] 戴亦一,潘越,刘思超. 媒体监督、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财务重述视角的证据[J]. 世界经济,2011(11):121-144.
- [10] 姜英兵,严婷. 制度环境对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研究[J]. 会计研究,2012(4):69-78.
- [11] 李慧聪,李维安,郝臣. 公司治理监管环境下合规对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基于中国保险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15(8):98-113.
- [12] 金鑫,俞俊利. 政府治理、终极控制与上市公司税收激进行为[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5):117-125.
- [13] Desai M, Dyck I, Zingales L. Theft and tax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84(3):591-623.
- [14] Badertscher B, Phillips J, Pincus M, et al. Earnings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tax benefits and detection risk: To conform or not to conform?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9,84(1):63-97.
- [15] Hoopes J L, Mescall D, Pittman J. Do IRS audits deter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2,87(5):1603-1639.
- [16] Hanlon M, Hoopes J L, Shroff N. The effect of tax authority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on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J].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2014,36(2):137-170.
- [17] 刘忠,李殷. 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 2002 年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的自然实验[J]. 财贸经济,2019(7):5-19.
- [18] 李彬,刘小梅,姚瑶. 税收征管、债务政策激进性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0-22.
- [19] 于文超,周雅玲,肖忠意. 税务检查、税负水平与企业生产效率——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经济科学,2015(2):70-81.
- [20] Alm J, Liu Y. Corruption, taxation, and tax evasion[J]. Journal of Tax Research, 2017,15(2):161-189.
- [21] 李清,马泽汉. 会计信息质量指数构建、评价和预警研究[J]. 数理统计与管理,2022(4):749-760.
- [22] Dechow P M, Sloan R G, Sweeney A P. Detecting earnings manage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5,70(2):193-225.

- [23] Ohlson J A. Earnings, book values and dividends in equity valu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5,11(2):661 - 687.
- [24] Khan M, Watts R L. Estimation and empirical properties of a firm-year measur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48(2):132 - 150.
- [25] André P, Dionysiou D, Tsalavoutas I. Mandatory adoption of IFRS by EU listed firms and comparability: Determinants and analysts' forecasts[EB/OL].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10.2139/ssrn.1973259,2012. [2012-03-12]. https://hal.science/file/index/docid/935799/filename/422_AndrA_Dionysiou_Tsalavoutas.pdf.
- [26] 朱晓婷,杨世忠. 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分析——基于2002—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2006(11):16 - 23.
- [27] 刘骏,刘峰. 财政集权、政府控制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的证据[J]. *会计研究*,2014(1):21 - 27.
- [28] 王晓亮,邓可斌.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提升资本结构决策效率吗? [J]. *会计研究*,2020(8):77 - 90.
- [29] Hadlock C J, Pierce J R.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23(5):1909 - 1940.
- [30] 王佳,李文. 柔性税收征管、声誉机制与企业税负:理论与实证[J]. *现代经济探讨*,2022(10):64 - 75.
- [31]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 - 120.
- [32] 陈骏,徐捍军. 企业寻租如何影响盈余管理[J]. *中国工业经济*,2019(12):171 - 188.
- [33] 许晓芳,陈素云,陆正飞. 杠杆操纵:不为盈余的盈余管理动机[J]. *会计研究*,2021(5):55 - 66.
- [34] 席鹏辉. 财政激励、环境偏好与垂直式环境管理——纳税大户议价能力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17(11):100 - 117.
- [35] 朱松,夏冬林,陈长春. 审计任期与会计稳健性[J]. *审计研究*,2010(3):89 - 95.

[责任编辑:高 婷]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Tax Burden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LI Qing, MA Zeha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sample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 - 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21,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ction direction, action mechanism and differentiated effect of enterprise tax burden o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ducing enterprise tax burde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which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suggests that reducing enterprise tax burden can improve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through two mediating paths: reduc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agency cos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reducing enterprise tax burden o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is more obvious in companies with high tax payment contribution, short audit tenure and high analyst focus.

Key Words: tax cut and fee reduction; tax enforcement; enterprise tax burden;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financing constraint; agency cost; government interference